

逝世二十周年
全新修订纪念版

钱锺书

杨绛先生生前亲自审读的个人全传

汤晏 著

一个三百年来难得一见的天才，
一部可靠生动的哲理性传记。



文化发展出版社
Cultural Development Press

錢鍾書

湯晏 著



文化发展出版社
Cultural Development Press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钱锺书 / 汤晏著. — 北京: 文化发展出版社有限公司, 2018.12

ISBN 978-7-5142-2490-0

I. ①钱… II. ①汤… III. ①钱钟书 (1910-1998) — 传记 IV. ①K825.6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8) 第270794号

钱锺书

著 者: 汤 晏

出 版 人: 武 赫

责任编辑: 尚 蕾

责任印制: 邓辉明

责任校对: 岳智勇

装帧设计: 朗月行

出版发行: 文化发展出版社 (北京市翠微路2号 邮编: 100036)

网 址: www.wenhuaafazhan.com

经 销: 各地新华书店

印 刷: 北京印匠彩色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: 710mm × 1000mm 1/16

字 数: 320千字

印 张: 22.5

印 次: 2019年1月第1版 2019年1月第1次印刷

定 价: 58.00 元

I S B N : 978-7-5142-2490-0

◆ 如发现任何质量问题请与我社发行部联系。发行部电话: 010-88275710

谨跪献给
先父母在天之灵

简体字版第三版自序

这本书是钱锺书（1910—1998）先生的一生传记。这本书是我出版的第一本著作。当年我撰写这本书时，我网球不打，白天睡觉，晚上伏案写书到天明才睡，我整整花了二年功夫完成这部书。现在想起来这是我个人出版的几本传记中出力最大，用功最深，费时最久，遭遇的困扰也最多的一本书。我的朋友林博文说写书有苦有乐，但对我来说是苦多乐少。最近要重订本书，我要找杨绛写给我的第一封信，但没有找到，可是无形中找到一封我写给杨绛信的副本。这封信是2001年12月17日写的，在信里可以看出我当时出书的况味。信不长我现在抄录如下：

杨先生：

好久没有给你写信，只是近来甚忙。书稿校样寄出后如释重负，但不久我就感冒了。因为我常打网球的缘故，我不生病的，但最近身体没有以前好。书于十二月三日出版，共计416页。本来书名《被压抑的天才钱锺书》，出版社不肯，后来双方同意用《民国第一才子钱锺书》，这是妥协的结果，我现在只希望钱先生传能卖得好。昨天早上台北《中国时报》一位女记者打电话来要我谈谈我写钱传的经过，大致都是她提问题由我来作答。最后我与她（女记者）说了一个小故事：美国有一位传记作家Leon Edel是写了五大册

的亨利·詹姆斯（Henry James）传。他说他写亨利·詹姆斯传时曾梦见詹姆斯三次。女记者乃问我，你呢？我说我也有这种经验，过去二年，我天天与“钱先生在一起”，故我做梦梦见钱先生。她问几次？我说“二次”。又问谈话了没有？答说有——我问了很多问题他都一一回答了。他是一个很和蔼慈祥的老人。这位女记者似乎对Edel及詹姆斯无甚印象，不然詹姆斯的故事还可以讲下去，也许可以apply到钱先生传记上。纸短言长，下次再谈，汤晏又及。

（这封信写在贺年卡上。）

关于梦见传主，后来我写叶公超传（《叶公超的两个世界》）及蒋廷黻传（《蒋廷黻与蒋介石》）都没有这种经验——我没有梦见过叶、蒋这两位传主。我也没有梦见蒋介石。

我最初写这本钱先生传记是在20年前，用“钱锺书新传”的题目在香港《纯文学》月刊上连载，刊至第十章该刊停刊，后来我还是陆续写下去；于2001年初由台北中国时报出版公司出版单行本，更名为《民国第一才子钱锺书》。2005年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，书名改为《一代才子钱锺书》，这是本书第一次用简体字排版在大陆上发行。本书第二次用简体字排版发行是在2013年由北京龙门书局出版（书名为《千古文章未尽才：钱锺书》）。在简体字第二版里我增加了一些新材料。可是现在文化发展出版社推出的新版里新材料更多。我很高兴也很感谢他们有兴趣出版这本书。因为今年是钱锺书先生去世20周年纪念。复次，在过去五年我又收集了不少有关钱锺书的新材料，最显著的是我利用这些新材料写成了一篇短文，题为“钱锺书访哈佛，1979”。（见本书附录五）此外，还增加了几个文苑小掌故。于1930年钱穆写了一本《国学概论》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，出书前钱穆请钱锺书父亲钱基博写一篇序言，这也是很平常的一件事。可是钱基博没有写，他叫儿子钱锺书代笔，那时钱锺书只有19岁，正在清华读大一，钱锺书照写不误，很快交卷，他父亲看了很满意，一字不改交给钱穆，钱穆在他自序里谢谢钱基博。

后来杨绛写文章说这篇文章是钱锺书写的，钱穆看到了当然很不高兴，钱穆晚年在台北出版的《钱穆全集》里把这篇钱锺书写的序言抽掉，在自序里把谢谢“子泉宗老”几个字也删了。（请阅本书19至21页）第八章《蓝田》的题词（epigraph）我稍作一番解释。在第十一章《北京》一章里面讲到钱锺书的《宋诗选注》，有人向钱锺书建议把《宋诗选注》的书名改一下，将“注”字删掉。钱锺书说“No”。他说：“不可以，这本书好就好在注。”所以那本书后来就没有改书名。（请阅本书第223页）我在2001年繁体字版自序里说：在这本书里有三个问题“我始终没有办法解决或者得不到满意的答案”，这三个问题，就是（1）钱锺书考清华数学考零分还是15分？（2）钱锺书离开西南联大的真正原因是什么？（3）最后一个问题是1949年大陆易手前夕，他为什么不往外面跑呢？现在有新材料出现，我有新的论断，我认为钱锺书考清华数学考零分，这是我花大量时间做了一些考证所得的结论。（见本书37至39页）。第二个问题，因西南联大外文系里有小politics（内部不和），叶公超与陈福田不喜欢钱锺书，他离开联大是被解聘了的。（见本书141及142页）第三个问题，可以写一本大书，不是三言两语能说得清的，容后再谈。我在旧篋里找到一章笔记“钱锺书访哥大侧记”，这是我在哥伦比亚大学座谈会上所得的印象。这是我第一次写钱先生的文字。我从这篇短文开始，最后终于写了一本27万字的钱先生传记，这就是古人云：“千里之行始于足下。”我现在就放本书附录四。

我在哥大拜见了钱先生后，我就有为他立传的念头。当初我为什么要写《钱锺书》这本书？我在台北版里曾有说明，但是大陆上海版没有印出来，不知何故？我不想再炒冷饭。我现在只想说一句话，我写这本书有一个主旨即是想把钱先生当“人”来看。知堂老人说：“一个人的平淡无奇的事实本是传记中的最好资料，但唯一的条件是要把他当‘人’去看，不是当做‘神’。”（周作人《关于鲁迅之二》，收入在《瓜豆集》）我不希望钱锺书成鲁迅第二。我对知堂老人的话奉为圭臬。所以我在这本书里就毫无忌惮大胆地说钱锺书考清华数学考零分，在牛津他有一门功课不及格（杨绛说他看错题目），

他离开西南联大是被解聘的（可是杨绛说因为没有收到梅校长的电报）。

常有人说，钱锺书在清华毕业后不肯留校读研究所，他还说：“整个清华没有一个教授有资格充当钱某人的导师。”杨绛说她问过钱锺书，他说没有这回事。同样情形，他离开西南联大时曾扬言：“西南联大外文系根本不行，叶公超太懒，吴宓太笨，陈福田太俗。”这种话的语气，很像钱锺书说的，杨绛出来否认。但是反过来说，说了又怎么样，这是鸡毛蒜皮的小事，无伤大雅，用不着大惊小怪。钱锺书不是说过：“二十岁不狂，没有志气；三十岁犹狂，没有头脑。”我们何必去斤斤计较呢！在这里我要为钱先生说几句话：他没有喊蒋介石万岁，也没有喊毛泽东万岁。见了姑娘，他不像徐志摩那样会招蜂引蝶。难道我们要他做圣人？

在这本新版书里我肯定钱锺书的《管锥编》的价值，《管锥编》是钱锺书避世主义（escapism）下的作品，这不是一个坏名词，这是中国文人的伟大传统。自古以来中国文人常在逆境中写一些与世局不相关的作品。甲午战后马建忠幽居沪滨撰《马氏文通》；1914年陈独秀讨袁失败后逃亡日本著《字义类例》；胡适于1949年流亡美国，寓居纽约研究《水经注》；“文革”时期钱锺书写《管锥编》。钱锺书应该属于这一类，毫无疑问他是中国百年来最近的一个例子。

最后我要来谈这本新版书的书名。这本书过去出了三个不同版本，由不同的出版社出版，有三个不同的书名——用了很多不同的形容词；钱锺书是一个近世博学鸿儒，“三百年来难得一见的天才”；我想以钱先生大名，他的书名用不着要形容词。是故我现在把这本增订本就定名为《钱锺书》，这三个字简单明瞭一目了然。一般而言，一本书的生命要比人的寿命久；我希望这册增订本——《钱锺书》久远流传下去。

汤晏 二〇一八年十二月二日 序于纽约晨边高地

简体版第二版自序

本书的大陆简体字版第一版出版于2005年春天。书出后，美国俄亥俄州扬斯敦州立大学（Youngstown State University）历史系的黄培教授曾撰一英文书评刊于China Review International（《中国书评季刊》，Vol. 14, No.2, Fall 2007），对本书提出了一些很有价值的批评与建议。他认为第一章“家世”、第二章“幼年”、第三章“父亲钱基博”，这三章可以合并为一章。于是在本次新版中我将第一、第二两章合并为一章，至于“父亲钱基博”一章，我考虑再三，还是想让它独立成一章。他也建议将最后两章即第十五章及第十六章合并为一章，我采纳了，故新版一共只有十四章。

黄教授还指出我在“出国访问”一章里，讲到钱锺书在美国东西两岸访问名校，我对哈佛及芝加哥大学讲得太少。这是我的疏忽。关于芝加哥大学，十多年前我曾写信给在芝大执教的芮效卫（David Roy）教授，他回信说，他因远游而没有参加1979年钱锺书访问芝大的座谈会，但他参加了于1978年访问大陆的美国汉代学者访问团。在北京时他们一行曾与钱锺书、俞平伯及其他学者有一个很愉快的谈话会。芮教授还寄了一份长达58页的旅行日记给我，题为“Journal of a Trip to China, October-November, 1978”。其中第46页至51页，是讲钱锺书的，我利用这些材料在本书里曾有叙述（请阅本书第322页至323页，简体版第二版，下同）。时间隔得那么久，对这两所学校的

疏漏，补写已比较困难，尚希望读者朋友能帮我忙。

光阴荏苒，自初版面世以来，俯仰之间已十二三载矣！自上次再版也快要七八年了。但在过去十多年来，我仍不时搜集材料。在这次新版本里，我增加了很多有关钱锺书的新材料，比如陆放翁的“示儿诗”等，但我最“得意”的是找出了在英国史上一年内有三位君王的名字及其年代。当钱锺书1936年在英国的时候，这一年英国先后有三位君王，此即乔治五世、爱德华八世以及乔治六世，这是极其罕见的。但在英国历史上发生过几次，那时我不知道，在旧版上只能说：“这是极其罕见的。”最后我终于在英国中古史里找到了：1066年也有三位君王，此即爱德华忏悔者、哈罗德二世及威廉一世；在1484年有爱德华四世、爱德华五世及理查德三世。我现在都把这些新材料写在新版里（请阅本书第125页至126页）。

本书里我谈到美国作家厄普代克（John Updike）与钱锺书有很多相似的地方，并做了一个粗略的比较：厄普代克也写畅销小说；在大学毕业后也像钱锺书一样带了新娘子至牛津深造；他的大女儿也是在牛津出生。这位美国畅销作家于2009年1月病逝，以后就没有兔子小说了。我在此次新版里把这些都补进去了（请阅本书第314页至315页）。我补的最新的一条是钱锺书在英国留学读书的牛津大学。去年夏天我在《纽约时报》上看到一条报导牛津的消息，我很感兴趣，把它抄下来。众所周知，哈佛和耶鲁是美国最有名，也是最古老的大学，记者说可是当你到了牛津，则哈佛与耶鲁就像一个baby-faced freshman（娃娃脸的大一学生）了。我觉得这个比喻很好，也很有趣味，所以乘这次再版的机会就加进去了（见本书第112页）。这种例子很多，大小小小约有二三十处之多。常常有人问我，是如何认识钱先生的，所以在本书附录，我加了一篇纪念文章《回忆“魔鬼夜访”过的钱锺书先生》。上述这些新加的材料在过去的版本里是没有的。在某些地方，我也略作些修正与补充，或章节长短之剪裁，所以这本书可以说得上是新版了。

新版有很多特色，最称道的是参与编辑的工作人员，他们很勤苦地为本书编了一份至为完备的索引。编索引是很辛苦的（我也编过）——枯燥乏

味，但这对读者好，方便读者，读者会感谢他们的，正如佛家所说“功不唐捐”。黄培教授还建议我应该列有参考书目，我做了，还加了一个传主的年表。此外，书名也改了。这是编辑郝明慧女士的主意，她说这个书名比另外一个待选书名（《清华才子钱锺书》）“稍微丰满些，设计上更丰富些”。我把两个书名对我友吴燕坤教授讲了，他很热心，做了一个survey（征询意见），我从众。他说书名主题应在序言里点出来，因为本书“结语”里的最后几句话就此可以做出交代，就不再赘述，现照录如下：钱锺书“生不逢辰，他生在20世纪动乱频仍的中国——军阀割据，抗日战争，国共内战及‘文化大革命’，因此把一个三百年来难得一见的天才毁了。时代辜负了他。钱锺书有志著述，但今日留下来的著作，不够传述其才华于万一，的是‘千古文章未尽才’，用曹子建的一句话来说，钱锺书是‘常斐然有述作之意，其才学足以著书，美志不遂，良可痛惜’。”

最后我要感谢龙门书局及郝明慧女士，没有他们的青眼与支持，这本新版书不可能与读者见面。借这个机会我也在此感谢黄培及燕坤两兄的援助。

2013年4月23日下午汤晏序于纽约

（牺牲了一个siesta*）

*Siesta是西班牙文，午睡的意思。西班牙人有午睡的习惯，首府马德里通常是很热闹的，通衢车水马龙，街道来往行人如蚁阵，可是一到中午，马德里一片寂静，商店关门，车辆停驶，平时很热闹的京城，顿如弃市。可是过了午后，这个城市又复苏过来。我年老了，就像西班牙人一样每天都要午睡。为了赶写这篇序言，我今天没有午睡，所以我说“牺牲了一个siesta”。

杨绛先生函

汤晏先生：

昨天收到您10月15、16日二信及附件，谢谢！您的《钱锺书传》快要出版了，我向您贺喜。您孜孜矻矻为他写传，不采用无根据的传闻，不凭“想当然”的推理来断定过去，力求历史的真实；遇到不确切的事，不惮其烦地老远一次次来信问我，不敢强不知以为知。我很佩服您这种精神。但是，我只对您提出的问题作了答复，却未能从头至尾细读原稿；对于您所采用的某些资料是否可靠，我不知道。所以，我不敢应命为您写序。而且您和我的观点也不相同。钱锺书不愿去父母之邦，有几个原因。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他深爱祖国的语言——他的mother tongue，他不愿用外文创作。假如他不得已而只能寄居国外，他首先就得谋求合适的职业来维持生计。他必需付出大部分时间保住职业，以图生存。凭他的才学，他准会挤出时间，配合职业，用外文写出几部有关中外文化的著作。但是《百合心》是不会写下去了。《槐聚诗存》也没有了。《宋诗选注》也没有了。《管锥编》也没有了。当时《宋诗选注》受到批判，钱锺书并没有“痛心疾首”。因为他知道自己是一个“旧知识分子”。他尽本分完成了一件工作，并不指望赞誉。赞誉会带来批判。批判多半是废话。废话并不能废掉他的成果。所以他心情很平静，还只顾补充他的《宋诗纪事补正》呢。这部书不久就要出版，有十多本。他的读书笔记和心

得，作为《钱锺书手稿集》，已交商务印书馆扫描印行，明年年底也可出版，大约有十大本。此外，我也许还能为他整理出一些作品。但是钱锺书在创作方面，的确没能够充分发挥他的才华。“发短心长”，千古伤心事，不独钱锺书的创作。您的设想属浪漫派，我的设想较现实。反正同是设想而已。我耄耋之年，没力量为您写序很抱歉，只好写封信感谢您对钱锺书的器重，也谢谢您对我的信任。祝愿您的书有许多许多读者。

杨绛谨上

2001年10月28日

简体字版前记

北京一石文化策划将我的《民国第一才子钱锺书》（台北时报公司出版）出版简体字版，这是我很感谢的。他们建议将书名改题为《一代才子钱锺书》，我也同意了。综观钱锺书一生，才辩纵横、神采飞扬，是一不世之才。他天赋过人，又勤奋好学，当我为他立传，每念及此，总觉得时代辜负了他，未能让他一显身手，诚属一件很可惜的事。以他的学养与才华为当世一个大才子是不争的事实，但我在出版繁体字版时用《民国第一才子钱锺书》作书名，就有人诘询说，谁是第二才子？谁是第三才子呢？易生纷扰。故现在简体字版用《一代才子钱锺书》为题似甚恰当。

本书能在大陆出版，对我来说还有一种特殊意义：我是江苏人，我家世居北沙（在长江边），距上海很近。于1947年我随父母到台湾，以后就没有回去过。可是五十年来（快要六十年了），故园桃李，时时入梦。我有时也会低吟唐人贺知章的还乡诗：“少小离家老大回，乡音无改鬓毛衰。”现在年老了，出外旅行，视为畏途，自忖不会像贺进士一样有还乡的可能，故今暂且将钱传在大陆出版算作我“游子归来”。

最后趁这个机会，我要谢谢北京一石文化的董秀玉、马健全以及台北时报公司的林馨琴、吴家恒。

2004年除夕汤晏记于纽约

引言

我接触钱锺书的作品很早，回想我尚在台北建国中学读书的时候，某日放学回家，一位同学在我背囊中塞了一本书，打开一看，是钱锺书写的《写在人生边上》。这是一本薄薄的小书，我囫圇吞枣，很快把它读完。现在想起来，在当时我未必能够懂得欣赏作者的睿智与文采。譬如，该书第一篇《魔鬼夜访钱锺书先生》就是一篇趣味隽永、意义深长的散文，借魔鬼夜访钱氏和作者的一段对白，针砭时弊，隐寓嘲讽。其中使我印象最深刻的一篇当推《读〈伊索寓言〉》。也许是故事最迎合十几岁大孩子的心理，我读完后，还把全文抄录在日记本里，当时就认为作者才气很高，文字俏皮。那是1949年以前的事，不久中共建立政权，国民党退处台湾，痛定思痛，想要找出失败的原因（原因当然有千百种），最后得出一个结论：打败国民党的不仅仅是解放军，知识分子也有份。这个结论正与19世纪英国学者布尔沃-利顿（Edward Bulwer-Lytton, 1803—1873）的名言“The pen is mightier than the sword”（笔之力甚于剑）的说法不谋而合。因为国民党有这样的想法，所以，所有大陆的作家的作品在台湾都被视为禁书，即使沈从文、钱锺书等人毫无政治意味的著作亦不例外。从此在台湾就看不到钱锺书的作品了。

20世纪60年代中期，我去美国读书，某日在纽约华埠友方书店看到一册香港盗印的钱著《写在人生边上》，如见故人，很是高兴，就买了下来。后

来也陆续看到钱著的其他盗印本，如《人·兽·鬼》、《围城》及《谈艺录》等，也一本一本地买来细读，对钱锺书的才华佩服得五体投地。后来万万没有想到，1979年钱锺书随中国社会科学院代表团来美国访问，我在纽约拜见了这位心仪已久的江南才子——钱锺书先生。确切的时间为1979年4月23日下午2时，地点在哥伦比亚大学悬德堂（Kent Hall）四楼会议室。在夏志清先生为他安排的座谈会上，我就坐在钱先生对面。这个座谈会是很精彩的。钱先生讲得一口流利而带有英国腔的英语。事前没有准备（也无从准备），可是他口才很好，有问必答，绝无冷场，妙语如珠。正如夏先生事后对人说：“钱锺书表演了两小时，满堂热烈鼓掌。”那年钱先生游美在东西两岸学术界风靡一时。钱先生在《论文人》（收入《写在人生边上》）一文中说，“卡莱尔在《英雄崇拜论》里说文人算得上英雄”，现在钱锺书在我们心目中亦可作如是观。

钱先生游美返大陆后，我们经常通信，我屡获钱先生赠书，后来几乎成了“钱迷”。那时我就有给他写一本传记的念头，可是没跟他提起，倒是我常常对朋友说，“我要为钱锺书立传”，这话当初说了好几年，一直没有动笔。光阴荏苒，二十年过去了。二十年来变化很大，钱锺书从一个被冷落的人而变成“印第安人”（红人）——一个热门人物。他的作品如《围城》等书不仅在大陆再版，且在台湾出版，有关钱锺书的书充斥坊间。过去二十年我读遍了海内外所有有关钱锺书的著作——从胡定邦及胡志德（Theodore Hutters）的博士论文到大陆出版的张文江和孔庆茂的《钱锺书传》，以及最近Ronald Egan的英译《管锥编》。我深深觉得胡定邦和胡志德的论文太偏重于学术研究，而大陆出版的钱锺书传记也有些框框，有框框就有忌讳，就不能畅所欲言。胡适说得好：“传记文学写得好，必须能够没有忌讳，忌讳太多了，顾虑太多，就没有法子写可靠的生动的传记了。”

钱锺书晚年缠绵病榻，于1998年年底在北京仙逝。故人凋零，不胜悲怀，更使我追念这位中国“当代第一博学鸿儒”。为了实践二十年前许下的私愿，我决心为钱先生写一部“可靠的生动的传记”。埃里蓬（Didier Eribon）为福柯（Michel Foucault）作传时一开头就说：“写福柯传是不好写的。”因福

柯是一思想家，且著作等身。写钱锺书传也一样不好下笔。钱锺书出版的书照西洋标准不算多，算不上“著作等身”，但他学贯中西，博古通今，思想敏锐，尤好讽世，所以有些话虽然他说得貌似平淡无奇，但却发人深省。即使他写的散文随笔，也都是隽永意纵，涉笔成趣，差不多每一则都是好文章，且有至理存焉。所以钱锺书传不是那么好写的。

写钱锺书传的另一困难处是，钱先生从不谈他自己。像福克纳（William Faulkner）一样，为了保护他的privacy（私人生活），关于他自己，守口如瓶。他没有像他父亲钱基博一样有自传留下来，也没有像胡适一样有《四十自述》及《口述自传》，故除了其夫人杨绛女士写的《记钱锺书与〈围城〉》外，要找钱氏早年的传记资料很困难。

英国维多利亚时代的名相迪斯雷利（Benjamin Disraeli, 1804—1881）叫人多读历史，少读传记。他说传记大多虚实参半——不是夸大，就是失实（过犹不及）。迪斯雷利所言，或许稍微偏颇，但可作为传记作者（biographer）的一个警戒。所以我写这部传记是本着两个原则：取材严谨，行文简洁。文中所述均有根据，然既非学术论文，就不一一注明来历，因此注解不求多，能省略者则省略之。大体上这部传记，略他人之所详，详他人之所略。

虽然这部传记不是讨论钱锺书创作或学术成就的专著，但钱锺书是一位学者、一位作家，所以不可能在论述钱锺书生平时不讨论钱氏作品及其学术成就；这部算是哲理性的传记，英文叫intellectual biography。每当我细读钱先生生平及其著作时常有几个问题系在我心头。钱锺书像伏尔泰（Voltaire）一样，留下一部为人传诵的小说（《围城》），他是否愿后世以小说家称之？他在逆境中完成了一部卷帙浩繁的《管锥编》，他是否以此为满足？他的天才是否已充分发挥？如果在太平盛世或在一个创作自由的环境里，钱锺书将是一个什么样的钱锺书？他是一个斯威夫特（Jonathan Swift）呢，还是一个伏尔泰？这些问题是我关心的，将在这部传记里尝试提出答案。